**参考演讲稿**：

背景上是西汉之初，统治者中流行的是黄老之学，较后有儒术的兴起。

内容上关联的是儒术独尊的历程这一章，简略谈述黄老之学到儒术兴起的前后转变，思路上是讲述转变前后的现象，转变前后的原因，以及最后的结论。

首先，汉初黄老之学在政治上占据相当的地位，特点上是“与民休息”，“省事节用”，“轻刑薄赋”，“简约易行”。总体上强调一个“治道贵清静” 的政治精神。

现象上举两个例子，汉初多选用“清静慈祥”的宽厚长者为吏，偏重于“治道贵清静”；

1.所谓宽厚长者,是为年长历事多，亲受秦法酷烈之害的人，因为亲身感受过动荡与秦法酷烈, 必事事思顺民情，与之休息。

2.这一点体现在窦太后，孝文帝等人身上，孝文帝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，强调躬修玄默，带头行事节俭。在社会凋敝、百废待举之时，儒家礼节显得繁杂浩费，与实际行政相差太远，非治世之急务。窦太后觉得儒生“多文少质”。

原因上：

我们说汉承秦制，然汉不是秦，

在秦代，官僚体制固有弊端由秦自身统一海内的进取精神、统治者的权欲，促使官僚机器的运转达到极限，在民力耗尽，民心丧尽之后自然土崩瓦解。

但时局所迫，继起的汉代统治者不仅需要承袭秦的体制，还需要将设法将官僚机器继续运作下去，所以此时兴黄老之学，让官僚机器的转速不断降低，尽量减少其所承担与发动的事物，缓和对于社会的压力，重新让为体制不断提供资源、已经疲惫不堪的社会获得休养生息的喘息之机。即统治阶级通过”无为”的方式牺牲官僚的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，避免失误，在这一点上，“其实易行”的黄老之学很好用。

另一点是，汉初统治集团多为武力功臣，“少文多质”，恰好区别与窦太后以为的儒生”多文少质”,无为政治崇尚“木诎于文辞”的“重厚长者”，讲究简约而“易行”，这一点也容易为武臣集团所接纳。

及至武帝之时,已过文景二帝治理。

而当社会元气渐复，其中所隐藏的各种问题冲突，就会通过社会的巨大规模和复杂程度放大，重新以尖锐活跃的形式表现出来。汉武帝以雄厚国力作为资本，着意改制建功，兴利，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一番宏大作为，意味着官僚机器不再能继续处于“无为清静”的状态之中，这使得庞大的官僚机器重新加速，在武帝时达到顶点。此时为了强化统治，加强中央集权，首先需要一种积极“有为”的理论作为指导，董仲舒所倡导的新儒学提供了机遇。在最后一个坚定黄老之学的核心掌权者窦太后去世后，新儒学开始走向独尊；

三世异治：高祖至吕后治乱世，内京师外诸夏

文景升平世，内诸夏外夷狄

武帝“治夷狄”作为自身使命，出兵征伐，寻求“不外夷狄”的太平世

《春秋》为汉制法

传闻之世-》所闻之世-》所见之世

用儒家思想改革法律,缩小承秦以来汉法与关东旧俗的矛盾.使汉朝将关中和关东置于统一法度管理之下.

看待政治文化上的演变往往从两点切入：1.对于政权合法性的阐发论证（ “五行”）；2.对于某种政治行为的合理性的讨论推敲（汉初“黄老之学”清静无为，恢复元气，武帝“治夷狄”，扩张国家实力）；

